

语言顺应论视域下《海上花列传》英译研究

陈怡莉

兰州工商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101

【摘要】本文立足Veschueren语言顺应论视角,从意识凸显、文化顺应、动态顺应三个角度对张爱玲、孔慧怡合译的韩邦庆作品《海上花列传》进行研究,分析了译文在上述三个层面的顺应。本文认为,张爱玲和孔慧怡的合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既顺应了汉英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顺应了原和目的语读者认知上的差异,实现了动态顺应。

【关键词】语言顺应论;《海上花列传》英译;意识凸显;动态顺应;文化顺应

引言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著名的吴语(苏州话)小说,该书全文由文言和苏白写成,书中对话皆用吴语,开创了中国方言小说的先河,其文学地位和价值毋庸置疑,有“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等美称。1981年,由张爱玲用汉语译注的《海上花》在台北皇冠出版社发行,让该书实现了从吴语向普通话的语内翻译。随后,2005年9月,张爱玲和孔慧怡合译的英文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

《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高,在国内文坛享有盛誉,加之该书的英译本为两位译者合译这一特殊性,吸引了很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角度对其英译本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进行探讨(黄勤,2007),有的从翻译策略的角度研究(陈吉荣,2007),也由研究借助语料库,从译者自我修改和编辑校订的角度研究(赵秋荣、曾朵,2020)。张必胜和王响(2024:53)提出Ve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是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整个翻译活动中充斥着译者的选择,这些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译者是有目的地对译材文本和翻译策略做出选择的。鉴于此,本论文在语言顺应论的基础上研究《海上花列传》的两位译者在哪些方面做出了顺应,探讨译者是否在某些层面实现了动态顺应。

1 语言顺应论

Veschueren(1999:56-58)在《语用学新解》中提出语言顺应论。在他的理论中,语用学研究从认知、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对语言的使用进行综观考察。语言的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决定了语言选择能否顺利进行,三个

特性中变异性和商讨性是语言选择的基础,而顺应性是根本,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出了符合交际需求的语言选择。变异性指语言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很多;商讨性指语言选择并不是绝对固化的,而是处于高度灵活的基础上;顺应性指为了实现交际目的,语言能够让使用者在可选项中做出顺应或变通。将语言的三者特性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包括时代背景、语言环境、文化属性、译者的个人意志等种种因素,导致源语和译语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原文已然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下只能译文去顺应原文的信息,而只要能够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译文在某些层面上主动地顺应原文是译者必然采取的翻译手段。

Veschueren(1999:66)围绕顺应性这一基石,他提出了顺应的语境关联、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意识的不同凸显程度这四个研究视角。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这一语用学的研究范式同样适用于翻译研究。

2 《海上花列传》英译中的顺应性分析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体现在其对语言的选择和顺应方面,这种主体意识会受到诸多客观语境因素的影响。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语境也会随之而不断变化,译者须依据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对语言选择和顺应的方式做出适时调整,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Veschu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包含语境顺应、语言结

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顺应过程意识程度，能够为客观、公正地研究张爱玲、孔慧怡合译的《海上花列传》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意识突显、动态顺应和文化顺应分析译文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顺应。

2.1 意识突显

意识突显是与顺应性媒介相关的意义生成过程的状态（邓隽，2019）。宋志平（2004）提出言语行为中的意识程度并非全然相同，而是存在一定的等级，翻译中译者同样存在这种意识的差异，当意识凸显程度较高时，译者会做出某些特殊选择从而满足某种目的。《海上花列传》原文中的人名大都富含深意，有的交代人物命运、有的暗指人物性格、有的描述人物所处环境，对这些人名如果按照惯例采用音译，则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原作者的巧思，从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文化折扣。

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名便是娼优妓户的名字，需要悦耳悦目，充分展示魅力，如“翠凤”译为“Green Phoenix”，“秀宝”译为“Water Blossom”，此类名字译者均采用意译的方法，非常传神地传达出了名字本身的含义。此外，还有一类名字用来暗示人物性格，如初入社会、毫无城府地年轻人“赵朴斋”、“张小村”，译者将其译为“Simplicity Chou”和“Hamlet Zhang”，在社会上摸爬多年有财富积累的“罗子富”“马龙池”则分别译为“Prosperity Luo”“Dragon Ma”，“洪善卿”能够在朋友有难时伸出援手，却不曾保护好自己亲侄儿，译者将其译为“Benevolence Hung”，颇具讽刺含义。

由此可见，译者在小说中的人名进行翻译的时候意识突显程度很高，有意地顺应了读者认知和原文含义，让译文读者能够轻松地了解这些名字的含义减少了文化折扣。

2.2 动态顺应

动态顺应是Veschueren顺应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该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在语言的选择过程中，话语的意义会随着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语言的选择需要积极顺应具体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在翻译中更是如此，汉英两种语言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连淑能（1993：480）指出：“英语重形和，较宜以成分格局为主、功能意义为辅来划分句型；汉语重意合，较宜以功能意义为主、成分格局

为辅来划分句型。”由此可见，汉语重意合，多散句、流水句，句与句之间鲜少使用形式上的连接手段，而是靠内在结构和语义来连接；英语重形和，多用整句，句子之间靠各种连接词进行衔接才能达到意义上的连贯，体现出“以形显义”的特点。因此，针对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这些差异性，在翻译中译者需要动态地调整语言结构，以达到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原文1：黄二姐不解何故，两只眼泪油油的，看看子富，看看翠凤。（韩邦庆，1996：44）

译文1：Not knowing what this meant, Second Sister stared first at Prosperity, then at Green Phoenix, her eyes like a hawk's. (Eileen Chang & Eva Hung, 2005: 61)

原文1是典型的散句、流水句，各分句之间依靠语义进行衔接，很少有形式上的连接手段。方梦之（2022：2）提出从“意合”的汉语逻辑思维到“形合”的英语，很有可能会出现逻辑断层或逻辑模糊此时适当的结构增补是必要的。译文增加了“first……then”等连接词，将黄二姐的动作有机地衔接起来，并区分出先后顺序，充分体现出人物的贪婪、精明和势利，是译者有意地顺应英语的逻辑思维对译文进行逻辑修补。

2.3 文化顺应

语言顺应论是一种综观理论，能够对语言现象从社会、认知、文化等层面展开解释，其中，文化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层面。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层面差异很大，如果不加调整地展现原文内容，则无法实现翻译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因而需要译者从文化维度对顺应原文，对译文进行调整和意义的补偿。

原文4：因此菊花山也做成八字式的，回环合抱，其上高与檐齐，其下四通八达，游客盘桓其间，好像走入“八阵图”一般，往往欲吟“迷路出花难”之句。（韩邦庆，1996：356）

译文4：As there was space in front of the tower, the chrysanthemum hill was also constructed in the shape of the inverted “V”, parallel to the building. The hill was as tall as the eaves on the tower, and

the many pathways within led in all directions. A sightseer walking alone the path would feel as though he were in a maze, “lost his way among the flowers”, as the poet says. (Eileen Chang & Eva Hung, 2005: 495)

“八字式”是汉语语言文化特有的表达，按照字面意思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如果生搬硬套解释它的英文含义，有可能让英文读者一头雾水，或就算理解了原文含义，也丧失了源语文化应有的美感，得不偿失。英文字母“V”的形象与“八字式”较为接近，这样的译法既顺应了英语读者的认知，也基本表达出了原文的含义，避免了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陌生感，达到了与源语认知域基本相同的概念映射。

此外，原文中出现的“八阵图”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作者将其译为“maze”，即“迷宫”，虽不是同一物体，但便于译文读者理解，表达出菊花山蜿蜒不绝、四通八达的形象。可见译者在处理部分文化词汇时，充分顺应了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做出了翻译选择，实现了动态的文化顺应。

3 结语

本文立足语言顺应论视角，阐释了《海上花列传》译文从意识突显、动态顺应、文化顺应三个层面对原文、源语、目的语的顺应。首先，由于原作者在小说人名方面颇费心思，不同的人名基本都暗含了人物的相关信息，因此在翻译人名时，译者的意识突显程度很高，既顺应了人名的中文含义，也顺应了读者的认知，能够让译文读者轻松了解人名的含义；其次，尽管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层面存在很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时尽量能够顺应英语的习惯性表达，在契合原文含义的基础上，极大地顺应了英语的句法形式；最后，作为中国方言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中有很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译者在处理此类词汇时做到

了在保留中文意义的基础上，尽量顺应英语读者的认知。综上所述，两位读者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到了动态的顺应与协调，很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1] Chang E, Hung E.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rnold, 1999.
- [3] 陈吉荣. 从分离到融合到互生——张爱玲、孔慧怡《海上花列传》翻译策略谈[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2): 1-4.
- [4] 邓隽. 语用综观视域下《丰乳肥臀》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5): 73-77.
- [5] 方梦之. “翻译策略”何以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第一高频词[J]. 上海翻译, 2022(02): 1-6.
- [6] 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7] 胡适. 《海上花列传》序[A]. 张爱玲(译). *海上花开*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7.
- [8] 黄勤. 归化与异化相得益彰——评张爱玲译《海上花列传》[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8): 41-43.
- [9]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39.
- [10] 宋志平. 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2): 48-52.
- [11] 张必胜, 王响. 语言顺应论视域下华蘅芳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研究[M]. 上海翻译, 2024(02): 48-54.
- [12] 赵秋荣、曾朵. 译者自我修改与编辑校订研究——以《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例[J]. 语料库语言学, 2020(2): 35-38.